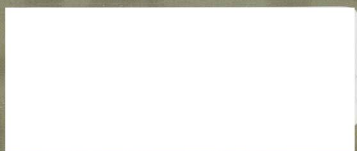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河南大学出版社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 3 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3辑/苗长虹主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649-0687-0

I. ①黄… II. ①苗… III. ①黄河流域—文化史—丛刊②黄河流域—
可持续发展—丛刊 IV. ①K292—55②X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0472 号

责任编辑 程若春

责任校对 李欣

封面设计 马龙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338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专 论

中原地区与汉字体系的早期形成..... 王蕴智(1)

历史与文明

夏商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交流探究..... 陈朝云(29)
黄河漕运述论..... 赵 炜(41)
我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浅析..... 林观海(54)
明代孔颜曾孟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 汪维真(64)
明代河南学者王祖嫡行实研究..... 牛建强(91)
黄土高原沟壑区土地垦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清至民国时期洛川塬为例
..... 王 晗(119)

民俗与文化

北大歌谣研究会与启蒙运动..... 刘锡诚(132)
孙作云的图腾观..... 姚向奎(145)
《山海经》与中国古代神话群的地理发现..... 高有鹏(169)
元宵习俗探究..... 彭恒礼(186)
河南灵宝道情皮影研究..... 李珊珊(202)

中原地区与汉字体系的早期形成

王蕴智

摘要: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且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石器等上面的符号。远古时代的符号遍布全国各地,它们为解释汉字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本文择取出土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远古符号为例证,同时考察一些早于殷墟时期的古汉字遗迹,对古汉字体系的形成问题做了初步探讨,认为汉字起源与演进并不是一条单纯主线,而汉字体系的早期形成应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关键词:黄河流域 文明 远古符号 汉字起源

作者简介:王蕴智(1955~),男,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1)

研究中华古代文明,迫切需要探讨文明起源的问题,而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文字的出现。汉字的起源是个古老的命题,这一命题至今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古代颇流行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①,宋代学者郑樵曾提出书画同源、“六书者,皆象形之变”的学说^②。近代以来,仓颉造字说已不为学者所宗,大家多倾向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至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西方人,因为不足以了解中国文字的原始,他们或把汉

① 古代典籍里有许多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例如《世本》:“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李斯《仓颉篇》:“仓颉作书,以教后谄。”《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② 参见郑樵《通志·六书略》。

字错误地看成是由外域传入的,非源于本土^①,或是简单地把汉字起源的绝对年代定得偏晚^②。最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且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远古时代的符号遍布祖国各地,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开拓了新的思路。本文谨分别取证讨论那些比较典型的出土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远古符号,同时通过考察早于殷墟时期的一些古汉字遗迹,从而对古汉字体系的形成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对长江流域远古符号的考察

(一) 大溪文化(附屈家岭文化)时期刻画符号

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史前陶器符号的遗址,比较重要的有湖北宜昌杨家湾、清水滩,秭归柳林溪等处。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前3400年之间。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杨家湾遗址出土的高圈足彩陶碗、陶钵的外底部,发现有50多种刻画符号^③,兹择要摹写其中的41例(见图1·1-41)。在此之前,还在宜昌清水滩遗址发现有数种陶器符号^④,其中时代偏早的属于大溪文化系列(见图1·42、46),晚期的刻画则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存(见图1·43-45),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前2600年之间。另据报道,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对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秭归柳林溪等遗址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一批大溪文化的陶器及刻画符号。其中有些符号多次重复出现,与杨家湾遗址出土的符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在种类上又有新的发现。另有一些符号刻画在陶器支顶部和陶罐的口沿部位,其年代比杨家湾遗址的还要早^⑤,这些新的材料尚在整理之中。

杨家湾遗址的刻画符号,一般都集中在器物底部的隐藏部位,这一特征与淮河流域中游地区蚌埠双墩符号的刻画习惯相近。然而杨家湾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及刻画风格,似乎又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存在着渗透关系。从符号的结体特征看,它们大体上是以简约的直笔为主调,由单纯线条的折合交错而成,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其中也有个别形体较为整齐,如图1·31、42诸例,其轮廓分明,富有图案装饰意味,似为某种固定使用的徽识。但总的来说,大溪符号所使用的斜笔和直笔较多,刻画短促纤劲,明快利落,而且较为随意。大溪符号延至屈家岭文化时代,历经千余载而自具特色,是长江三峡地区远古文化发

① 参见 I.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第98页图表54,美国芝加哥大学,1963年。

② 参见 Senner, M. Wayne: The Origins of Writing.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1989年。该书中把汉字起源的绝对年代断定在公元前1200年。

③ 宜昌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余秀琴:《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

④ 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省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⑤ 国家文物局三峡湖北工作站:《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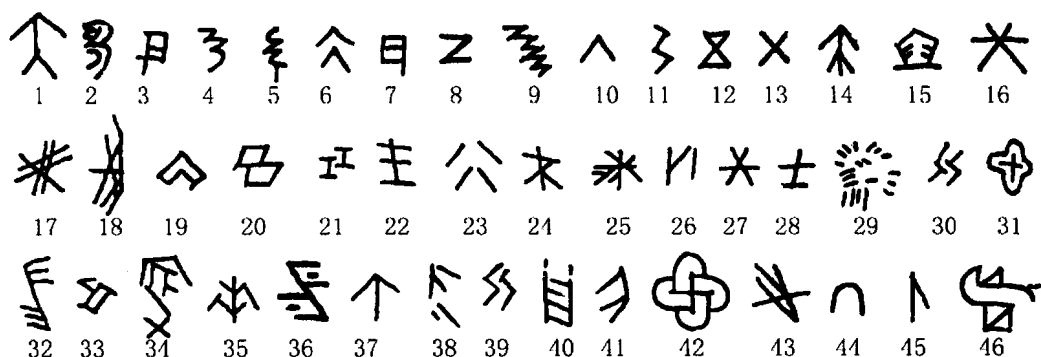


图1 大溪文化(附屈家岭文化)陶器符号

1-41. 宜昌杨家湾,《考古》1987年8期,763-764页;42、46. 宜昌清水滩一、二期;43-45. 宜昌清水滩三期(属屈家岭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9页图11。

展的重要标志。

(二) 石家河文化时期刻画符号

石家河文化是分布在我国长江中游地区龙山时代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的中心地带处于江汉平原,是在本地原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约在4700—4000年之间。自198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进行过多次发掘,分别在肖家屋脊、邓家湾(摹图注文中分别简称作肖、邓)两处遗址一共发现计约55个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大多是单独刻在大口陶尊的上腹部,偶亦见于陶缸的下腹部或高领罐的肩部,其年代均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早期。后经郑中华先生整理,刊发了大致成形的符号36例^①。兹剔除重复和笔画残缺者,谨摹写出其中的16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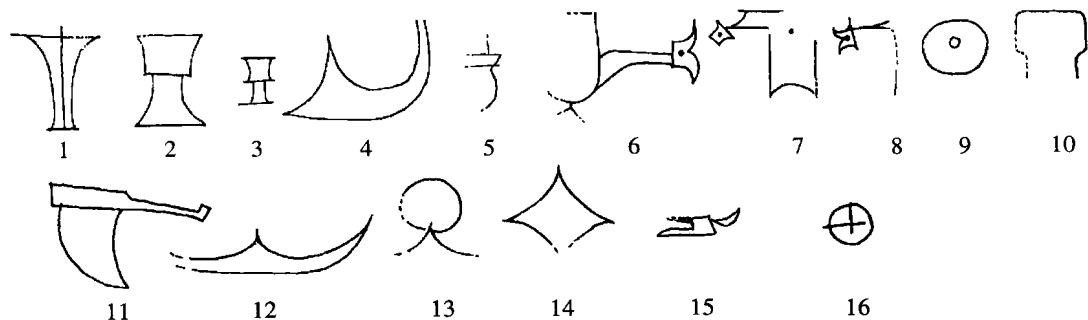


图2 石家河遗址群陶器符号

1. 邓 H65;2. 肖 H57:15;3. 邓 H2;4. 邓 AT302-T304 陶尊遗迹;5. 肖 AT1818^②;6. 邓 AT306^②下陶尊片;7. 肖 JY4:2;8. 邓 JY5:2;9. 邓 AT35;10. 肖 AT1219^②:70;11. 邓 H18;12. 肖 AT812^③:10;13. 肖 H327:3;14. 肖 JY5:2;15. 肖 H424:1;16. 肖 ATA2021^③:28。

从上图可以看出,石家河文化的刻画符号较多地利用了曲笔和富有图案化的洗练线条来构形,其不少结体当是物有所指,内涵丰富,匠心独具。如1-5形取材于某特定的器

^① 郑中华:《论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物,6-8例的主结构一侧皆附加有带点(戳孔)的图形,例11似取自装柄的镰形,例12或为13形之省文,其意蕴似与大汶口文化的 Σ 形符号相类。惜其中的有些结体多有残损,已不够完整。

(三) 崧泽文化时期刻画符号

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文化层和良渚文化层的遗址中,皆伴出有陶器符号,而且具有一定的地缘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青浦崧泽村遗址中层出土的几件陶器上曾见有4种刻画符号(见图3·1-4),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910—前3230之间^①,至70年代中期,这里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②,刻画符号又有新的发现(见图3·5-8)。



图3 崧泽文化陶器符号

1-4.《考古学报》1962年2期,7页图6;5、6.《考古学报》1980年1期,36页图7;7、8.《考古》1990年10期,903页图1、9、10。

崧泽符号大都分别刻在鼎、豆、壶三种器物的肩或颈部,其中一例是刻在釜形鼎的一足外侧。这些符号的笔道边缘呈涌起状,中心低凹,应是在陶胎未干时用纤锐的骨器或竹木类工具刻画上去的。崧泽符号的造型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符号相比,较多地运用了蜿蜒之笔和对称的原则,线条显得流畅和谐,结构布局也趋稳重而富有条理。其中有些形体显然是精意而成,并为地区间所通用。如分别刻在陶壶和陶豆上的图3·7、8二形,应是同一符号的变体或区别形式,它们造型严整,规则性强,符号特征介乎抽象与具象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类似的符号不仅反复刻画于崧泽文化的陶器上,而且还作为图案符号出现于大汶口文化陶器(见图4·1)及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出土的玉版、玉鹰中(见图4·2、3);另在江苏吴县澄湖出土一件良渚文化时代的黑陶贯耳壶的外腹部,也刻写有这一种符号(见图4·4,又见图5·19)。崧泽符号仍属于原始记事的性质,具有特殊的表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看成是文字的萌芽形式。但就汉字的起源而言,它们到底与古汉字是否存在着源承关系,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四) 良渚文化时期刻画符号

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晚于崧泽文化的浙江杭县良渚文化遗址中,共发现9种陶器刻画符号(见图5·1-9)^③。1960年和1966年,在上海马桥镇良渚文化层出土的陶片、陶缸以及三件陶盘、陶豆和陶杯的底部,曾分别发现6种刻画符号(图5·10-15),其年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② 黄宜佩、张明化:《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③ 施昕更:《良渚》25页,西湖博物馆,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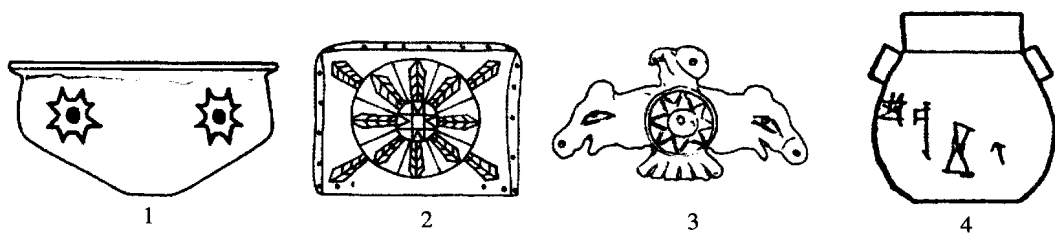


图4 形符号举例

1. 大汶口文化陶盆,《大汶口续集》167页,1997年;2. 凌家滩玉版,3. 凌家滩玉鹰,参《东南文化》1999年5期,26页图四;4. 良渚文化黑陶壶(参见下文)。

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150年^①。20世纪70年代之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出土的两件良渚文化陶器上,又发现5种刻画符号(图5·18-22)。其中一个符号刻在一件带流盂的腰部,其他4个符号则并列刻在一件鱼篓形贯耳壶的腹部,另外在上海亭林遗址出土的一件陶豆内底部和在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簋纽上,还分别刻有两种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符号(图5·16、17)^②。

上述符号一般是在器物烧成之后用尖锐状硬器刻上去的,其划痕挺劲而带崩裂,有的线条纤细,状如游丝。就符号的造型及其功用而言,情况则显得比较复杂。其中有些符号仍然属于简单的线性刻画标记的性质,而有些符号则极富规整,在结体和书写特征上都比较接近古汉字的风格。不仅如此,这类符号还多次出现排行连刻的例子,其在功能上也非常接近文字的性质。如马桥陶杯底部的两个符号(图5·14、15)和澄湖贯耳壶上的4个符号(图5·19-22)就属于这种情况。如上文所述,图5·19形是澄湖贯耳壶腹部4个并列刻画的左起第一个,它的造型与崧泽文化陶壶、陶豆上的符号十分接近,可以类比。这反映出这一类符号在太湖地区必然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及其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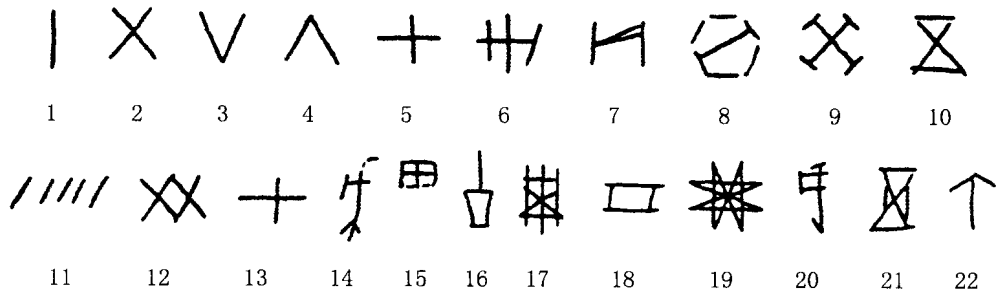


图5 良渚文化陶器符号

1-9. 杭州良渚,《良渚》25页;10-15,上海马桥(良渚文化层),《考古学报》1978年1期,115页图11;14、15又见《中国史稿》第一册,107页图16;16. 上海亭林,17. 上海马桥,18-22. 江苏澄湖,参《考古》1990年10期,904页图2。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15页图1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107页插图16。

② 张明化、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904页图2;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8页图壹。

史前陶器符号排行连刻的情况,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山东龙山文化陶书之外,唯以良渚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最为典型,实例也最多。将多个符号集于一器连刻,应是华夏文明早期发明文字的一个重要迹象。它表明至少从那个时代起,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在自觉地进行记录语句的尝试。良渚文化陶器上的不少符号,显然已经很像是文字了。不过,如图所示,迄今所见到的这些符号,在造型上还不尽成熟和成系统,尚很难确切地将它们和古汉字进行有机的联系。

二、对淮河流域远古符号的考察

(一) 双墩文化时期刻画符号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蚌埠吴郢乡双墩村,普查到一处淮河流域独具文化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1991和1992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在遗址东南侧凹沟内被填埋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一系列具有表意功能的陶器刻画符号,其年代大约距今有7300—7100年左右^①。

1989年,徐大立先生在吴郢乡双墩遗址试掘工作的基础上,发表了第一批出土于该遗址的陶器符号资料^②。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关注到这批符号,并撰文对新披露的146例59种双墩刻画符号做有摹记(图6)^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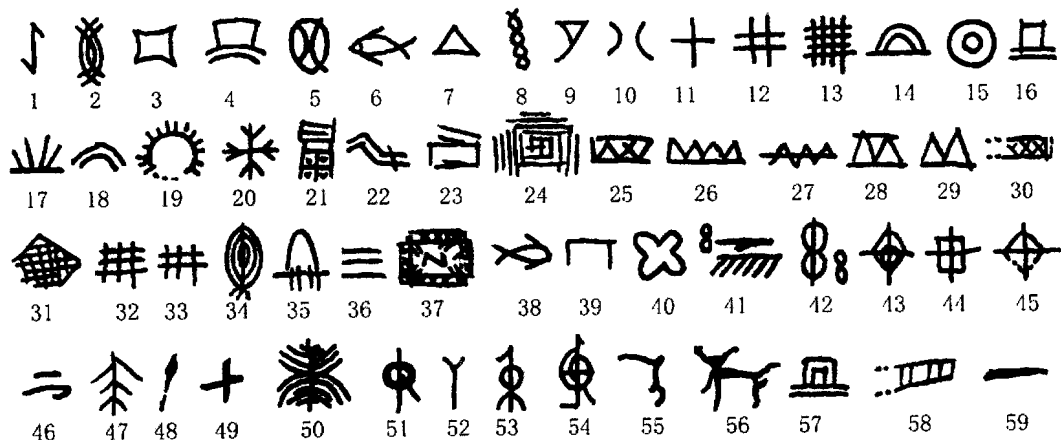


图6 双墩遗址1986年发掘所见陶器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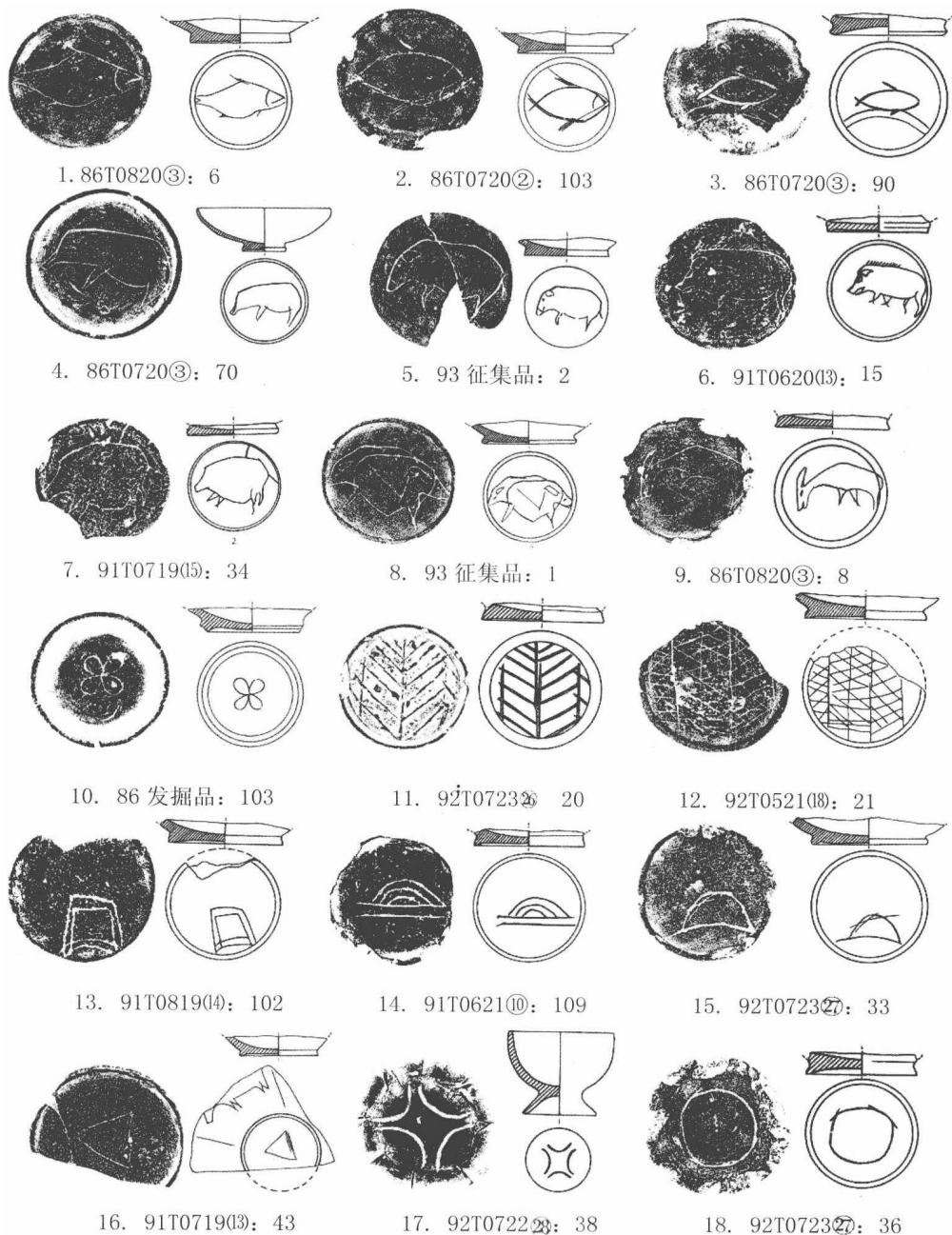
2008年,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双墩遗址发掘报告。该报告比较详尽地登记、描述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

②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47—255页。

③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书法报》1994年3月16日第2版;又见拙作《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第99页。

了 633 件出土于该遗址的陶器符号信息,并刊布了其中成形较好的照片、拓片和摹本资料^①。这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到双墩符号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及其特征(图 7)。



^① 该遗址陶器符号的登记信息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表二和附表三(第 480—496 页),陶器符号的拓片和摹本资料参见该报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第 183—398 页),照片资料参见该报告的彩版二八至彩版八八,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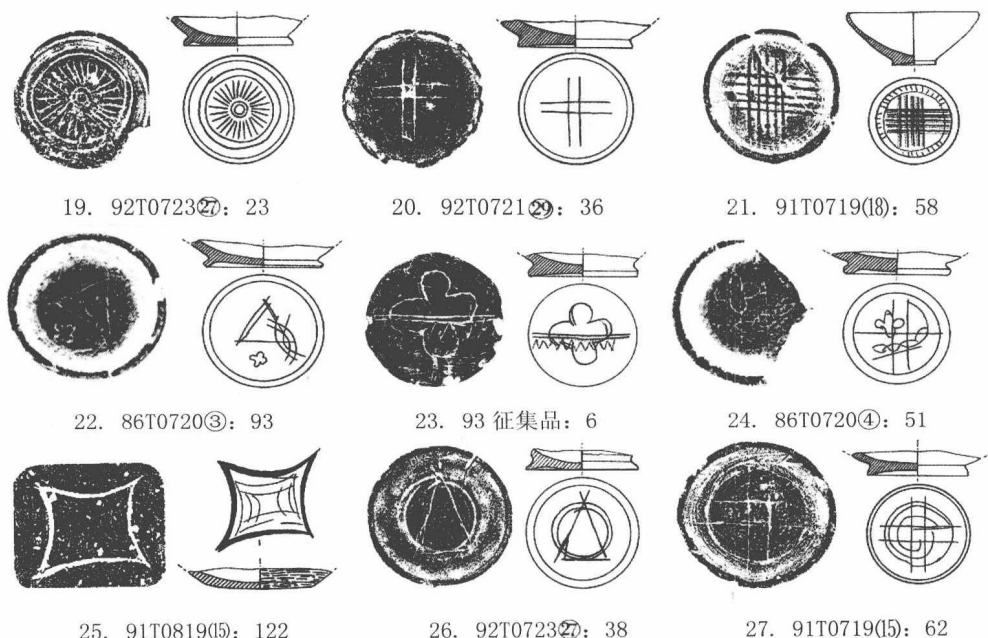


图7 双墩文化刻画符号图例

双墩遗址在上述三次发掘中共计出土陶器刻画符号六百余例,其发现数量之多,在以往的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从考古类型学上考察,双墩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地区,是一处独具文化内涵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双墩符号在时代上晚于出自中原地区的裴里岗文化贾湖符号,但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符号都要更早一些,而且彼此的文化面貌各不相同。

从载体上考察,双墩符号皆刻画在陶器上。而且绝大多数双墩符号都刻画或压画在双墩先民实用过的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符号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平底器的底部等部位。也就是说,双墩符号主要是刻画在实用陶器外底部这样的隐蔽位置,它们的作用不在于装饰,而是被赋予了具有特定的记事和表达概念的功能。从刻画痕迹上看,双墩符号大都是在陶坯烧制前刻画或压画上去的,也有少数刻痕较浅,或呈不规整状,乃在晾干的坯胎上或烧制成器后所刻。另外还见有少量似用剔刻或模印方法在陶坯上形成的阳文符号。双墩遗存中还存在有陶坯干透前后分别刻画的现象,即先把某种独立的符号作为主纹或底纹刻好后,再将另一种符号叠压补刻上去而成形。该遗址出土的骨锥、角锥和有锋利刃口的骨片,可能是刻画时所使用的工具。

在构形特征上,双墩符号大致可分为象形、几何形和组合形等多种结体方式。其中的象形符号共计 110 例,这方面包括有鱼、猪、鹿等动物形和植物形的符号^①,它们最具双墩文化特色。其余更多的是以三角形、菱形、半方框形、十字形、网格形、弧圈形等为主的符

① 双墩遗址 1991—1992 年发掘出土象形符号 59 例,1986 年出土象形符号 51 例。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五章,第 322 页和第 184 页,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号,这些几何形的符号重见比例较高,而且有繁简之别,表明在当时的先民中有比较广泛的认知程度。双墩符号的结体看上去比以往各地出土所见史前刻画符号更为复杂多样。其中有些属于简单抽象的记事或记数符号(如图6·1、7、10、11、12、15、36等例),但更多的符号则独具特征,其造型取材广泛,刻画技法娴熟,线条方圆兼施而富有变化。通过一些较为复杂的符号,还表现了如编织、渔猎等具有生活意义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原始文化的风貌。应该注意的是,双墩符号中已出现了部件组合式的构形,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符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一定的特指意义。如上揭图6·40就可分别与图6·8、12、33和与图6·2、7相组合,图6·41、42则是两种使用若干符号固定组合的例子。这样的繁复结构在各地出土的史前符号中是不多见的。

(二) 高邮龙虬庄南荡文化时期陶书

1999年,江淮考古学者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考古报告中刊布一则属于南荡文化遗存的陶书资料(采集,见图8)^①。该陶书刻写在一件泥质磨光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陶片内壁一共有8个刻画符号,纵向两行,每行4个符号;横向看则排为四行,每行两个符号,而且左边一端的符号局促紧凑,右边的符号则舒展呈横势。据发掘报告分析,龙虬庄遗址南荡遗存的文化性质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从豫东一带沿淮河再沿古邗沟向宁镇地区迁徙过程中的文化遗留。其年代被测定为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末至夏初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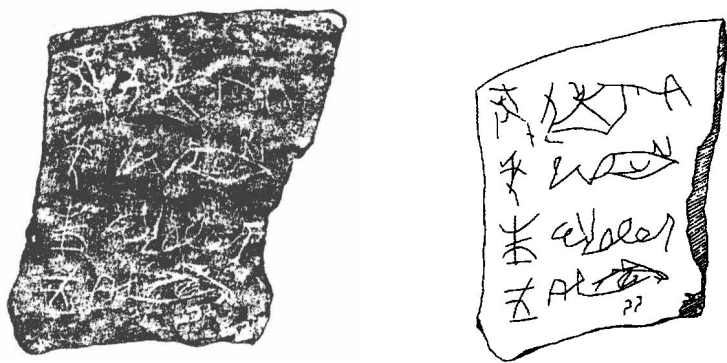


图8 高邮龙虬庄南荡文化陶书摹本、照片

龙虬庄陶书的刊布使我们在惊叹之余,自然会联系到1992年出土的邹平丁公山东龙山文化陶书(见图19)。这两版刻画符号在结体特征上并不类同,但彼此之间确又存在着较多的共性。首先,它们当时的年代大致相同,即都相当于文献和古史传说中的虞夏之际。其次,它们似乎都是以破损陶片作为书写对象,并同时使用多个符号来表达某一特定的语义或语句,因此也就具有“陶书”的性质。再者,两版陶书符号皆奇特难释,与早期古汉字符号无从印合,但二者不论是在结体上,还是在排行布局的谋篇技巧上都相当成熟。它们全然不同于以往所见陶器符号那种主要使用直笔或几何类线条的简单组合形式,也迥别于近乎图案化和结构上繁缛写实的象形符号。加之刻写者彼此刀法干练、情趣盎然,

^①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图3、2、4(拓片),又见彩版九。

几乎都是在连续操转他们手中的刀笔,快节奏地完成了这样两件极富线条动感造型且浑然天成的杰作。这两件陶书的出土并非偶然,它们很可能是在汉字体系正式形成前后,于一定区域范围内另外流行的特殊字体和特有书风,都属于原始文字的范畴(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原始文字应当说还不止这些)。当然,这些带有地域性特征的书写符号都与古汉字存在着亲缘关系,均不失为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上水之源。

三、对黄河流域远古符号的考察

(一) 贾湖裴李岗文化时期刻画符号

黄河流域远古符号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在许多文化类型的考古遗址中均有重要的发现。1983年至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贾湖村裴里岗文化聚落遗址前后进行了六次发掘^①。贾湖史前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发现有刻画符号10余例,时代距今8000年左右。兹摹写其成形较好的9例(图9),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种可与汉字起源命题相联系的刻画符号。

贾湖符号不但刻画于龟甲,而且还见于陶、骨、石器为载体上面(图10),这显然与后世的甲骨占卜及契刻文字之风有着渊源关系,所以贾湖遗存的出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贾湖符号中的有些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中的字形比较接近,如图8中的1、2、3、5诸形,有学者即径释作目、日(或户)、八、乙等字。如是这样,那么汉字产生的年代至少就可以追溯至8000年前了。不过现在还不宜遽下结论,主要还是因为材料不足,时代上有缺环。我们十分期待并相信类似于贾湖遗址的符号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到那时有关的话题还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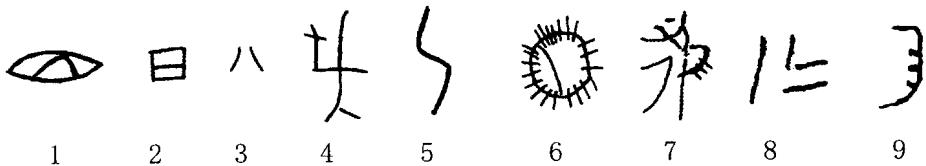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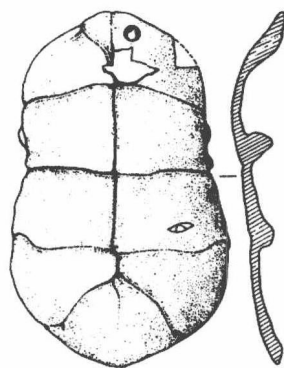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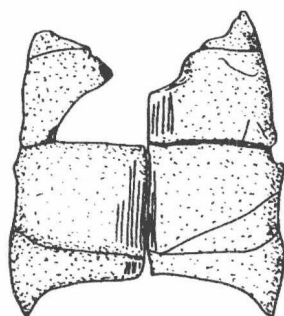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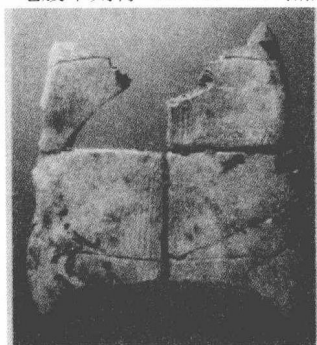
图9 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刻画符号

1. 龟腹甲刻符(M344:18,彩版四七·2);2. 龟腹甲刻符(M355:15,彩版四八·5);3. 龟腹甲刻符(M387:4,彩版四八·4);4. 龟背甲刻符(M387:4,彩版四八·1);5. 石颜料块刻符(H141:1,彩版四八·3);6. 陶卷沿罐刻符(H190:2A111);7. 叉形骨器刻符(M344:3);8. 牛肋骨刻符(H123:5);9. 八孔骨笛刻符(M2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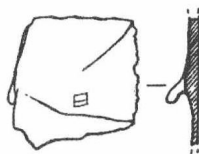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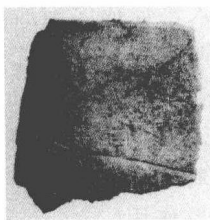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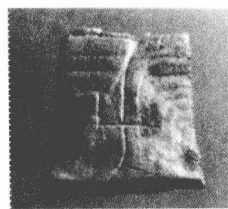
龟腹甲刻符 (M344: 18) 照片、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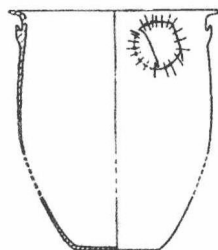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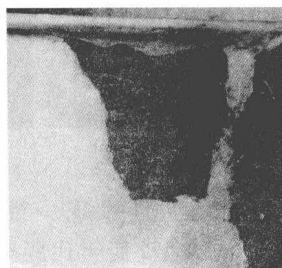
龟腹甲刻符 (M387: 4) 照片、摹本



龟腹甲刻符 (M355: 15) 照片、摹本



龟背甲刻符 (M387: 4) 照片、摹本



陶卷沿罐刻符 (H190: 2A111) 照片、摹本

图 10 贾湖遗址刻画符号图例

(二) 仰韶文化时期刻画与彩绘符号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重要遗址之一的西安半坡村,发现了一

系列陶器符号。这类符号前后在同一文化类型的陕西、甘肃、河南等 10 余处遗址中也有发现。仅在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刻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就达 133 件,符号 27 种;姜寨遗址出土 129 件,符号 38 种;李家沟出土 23 件,符号 8 种;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层)出土 10 多件计 10 种符号。另外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还发现有 3 种黑色彩绘符号,此一并摹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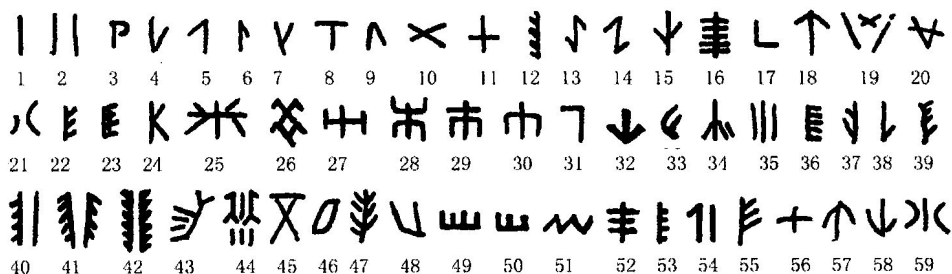


图 11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1-25. 西安半坡,参《西安半坡》197 页,图 1 四一;26-48. 临潼姜寨,参《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15 页图 3;49-51. 宝鸡北首岭(彩绘),《考古》1979 年 2 期,图版貳·4;52. 长安五楼;53. 邵阳莘野;54. 铜川李家沟,《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15 页图 4;55. 临潼垣头,《考古与文物》1982 年 1 期,3 页图 5;56-59. 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层),《文物》1983 年 11 期,25 页图 15、16。

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有着相当固定的刻写习惯,它们大都是以尖削状的器具刻画在钵形器外口沿的黑宽带纹上,而且一器只刻一个符号(见图 12·1),同一符号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起来可得六十余种^①。仰韶文化符号是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前的遗物,从陶片上的刻画痕迹判断,它们大部分是在陶坯入窑烧成之前所刻,其刻画匀挺酣畅,有一定深度。也有少数粗细轻重不均,刻画边缘有剥裂者,乃烧成之后新刻。从符号的构形特征看,它们以简单线条的排列穿插组合为主,象形的意味较少。虽然它们中的有些结体已形似于商周古文中的某些字形,但现在还很难把它们与后世的文字符号对应起来去解释。就这些符号的性质而言,它们显然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记事标志,这类符号的广泛应用,无疑对后来先民们发明文字产生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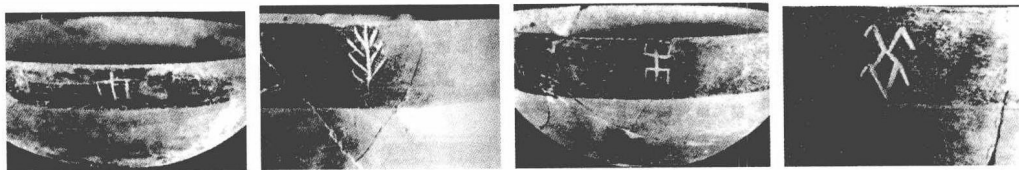


图 12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图例

1989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汝州洪山庙村史前遗址发现一批陶器符号和彩绘图案^②。洪山庙遗址的文化内涵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其年代距今在五千年左右。该

^① 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1978—1982 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 年第 11 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遗址所见符号分别契刻或彩绘于陶缸的外壁上(有些还彩画出特定的图案),如图 13·1 形系烧前在坯胎上刻就,其结体横平竖直,左右匀称,奏刀硬朗利落、施转有度。其他诸例亦线条洗练,用笔不凡。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先民们契刻或彩画一定造型符号的高超水平。兹摹写这类符号 6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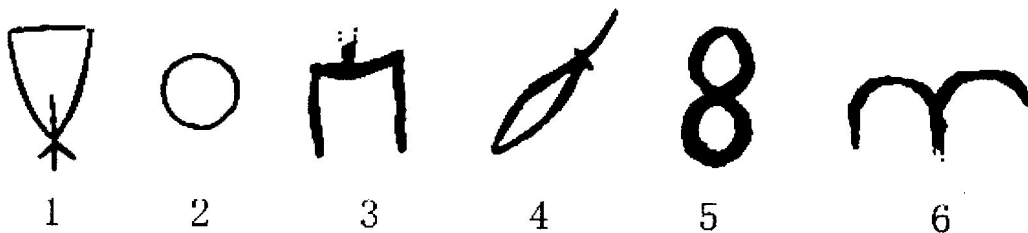


图 13 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彩绘符号

1. 刻符(W136:1,图 1-2·2 拓片);2. 刻符(W41:1,图 1-3·2);3. 彩绘(W39:1,图 2-7·6);4. 彩绘(W104:2,图 1-1·2);5. 彩绘(W60:1,图 1-2·1);6. 彩绘(W59:1,图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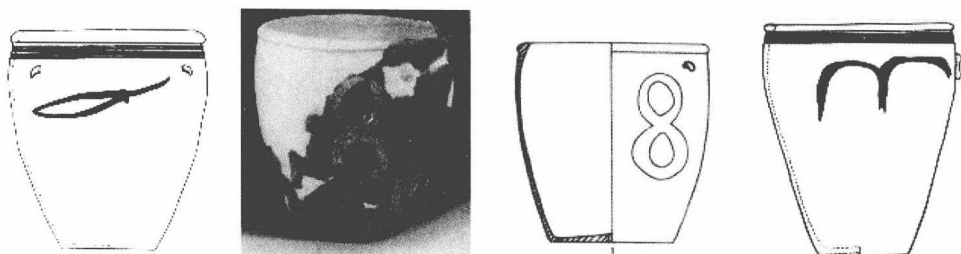


图 14 洪山庙仰韶文化彩绘符号图例

(三) 马家窑文化时期彩绘符号

分布在黄河上游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等地的马家窑文化,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就在甘肃半山和青海马厂两种类型遗址所收集到的陶壶和陶罐上,发现有 10 种用颜料描画的符号(图 15·1-10)^①。1974 年至 1975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青海东部柳湾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 697 件殉葬彩壶的下腹部,发现有用颜料绘写的符号,每件器也是只画一个符号(举例见图十六),计 130 余种,其时代距今约 4000 余年^②。兹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摹写于下(图 15·11-88)。

马家窑文化符号有部分形体与仰韶文化符号相近,另外还有一些以几何状为主的构形,其中有的线条组合比较繁复,独具特色。这些符号在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并且都有固定的位置,同样反映出它们不是随意的描写之物,很可能是起了制器者的专门标记或族氏花押性质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流通性。它们与仰韶文化符号一样,可以纳入汉字演进的历史轨迹上来考察,但它们与汉字的正式形成似乎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符号,都是在器物制成并干透后,用毛笔之类工具蘸上颜料绘写上

① 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 3 号 1 册,179—170 页,1934 年。

②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 年第 6 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